

中国十大文豪

苏轼

吉林出版集团 | 吉林文史出版社

· 中国十大文豪 ·

苏 轼

吉林出版集团 — 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轼/童一秋编著.
—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11.9
(中国十大文豪)
ISBN 978-7-5472-0834-2
I. ①苏… II. ①童… III. ①苏轼 (1036~1101)
—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8706号

苏轼

Sushi

出版发行/吉林文史出版社(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)

www.jlws.com.cn

编著/童一秋

责任编辑/姜越

责任校对/李洁华

装帧设计/柳甬泽

印刷/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/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/640mm×920mm 1/16

印张/17.75

印数/1—5 000册

书号/ISBN 978-7-5472-0834-2

定价/28.00元

苏轼，字子瞻，一字和仲，号东坡居士，眉州眉山（今属四川）人。生于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（1037年），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年）去世，享年六十六岁。后谥文忠。苏轼与父洵、弟辙，同为北宋文学家，合称“三苏”。

苏轼自幼聪颖过人，“闻古今成败，辄能语其要”。及至成人，博通经史百家之学，“奋厉有当世志”。（苏辙《亡兄子瞻墓志铭》）年方二十，游学成都，太守张方平以国士之礼相待。仁宗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，苏洵携二子轼、辙赴京应试，深得文坛巨擘欧阳修赏识。翌年，兄弟二人同中进士。嘉祐五年，授河南福昌主簿。六年，以欧阳修荐，应试制策，除大理评事、凤翔府签判。英宗治平二年（1065年），召试秘阁，得直史馆。父洵病逝，扶柩返乡。神宗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还朝，以殿中丞判官告院。时王安石执政，推行新法，因政见不合，上书力陈其弊，得罪新党，出为杭州通判。后徙知密州、徐州、湖州。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御史李定等人摭拾其诗文中语，诬告苏轼讪谤朝廷，被逮入御史狱，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结案后，贬官黄州团练副使，筑室东坡，以诗酒自娱。哲宗即位，擢知登州。司马光柄政，召为礼部郎中，历任起居舍人、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兼侍读。因不赞成尽废新法，反对以王安石配享神宗，遭到新、旧两党攻击。元祐四年（1089年），以龙图阁

学士出知杭州。赈饥治疫，疏浚西湖，修筑湖堤，民赖以安。六年，召为吏部尚书，改翰林承旨，知制诰。复出知颍州、扬州。明年，迁兵部尚书，兼侍读。八年，任端明殿学士、礼部尚书。哲宗亲政，起用新党，出知定州。其后连贬英州、惠州、儋州等地。徽宗即位，内迁廉州、永州，后复朝奉郎，提举成都玉局观。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年）移居常州。同年七月二十八日，一代文豪苏轼在常州病逝。

苏轼一生历经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、徽宗五朝，“仕至从官，出长八州”，困于俗吏、屡遭贬谪，却从不随波逐流，趋炎附势。他的思想比较复杂，儒释道兼而有之。政治上从儒家仁民思想出发，主张革除弊政，整顿吏治，但对王安石变法基本持否定态度。在生活上则以佛老思想为主导，更多地采取超然物外、与世无争的旷达态度。这种处世哲学是他身处逆境时自我排遣的精神支柱，也深深地渗透到他的文学作品中。

苏轼堪称中国文化史的千古奇才，他博学多识，才气横溢，在诗、词、散文、书法、绘画等领域都有极高造诣。其文自然流畅，不拘一格，纵横恣肆，挥洒自如，与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。其诗雄浑奔放，清新隽永，意境开阔，旨趣悠远，与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。其词超逸旷达，豪气四溢，婉柔韶秀，浑然天成，一洗五代宋初柔靡绮丽词风，开宋词豪放一派，与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。其书法长于行楷，飘逸洒脱，刚柔相济，与蔡襄、米芾、黄庭坚并称“宋四家”。其画力主神似，开宋代文人画之先河。不仅如此，苏轼对医学、养生学、水利、文物鉴赏、服饰、烹饪等均有独到研究。苏轼以天纵之才，执两宋文坛牛耳，其辉煌的文学成就，堪称集唐宋古文运动之大成。他的名篇佳作，不胜枚举，散文如《前、后赤壁赋》、《喜雨亭记》、《超然台记》、《放鹤亭记》、《文与可筼筻谷偃竹记》、《石钟山记》、《方山子传》、《潮州韩文公庙

碑》、《上梅直讲书》、《答谢民师书》、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、《留侯论》、《贾谊论》、《日喻》、《文说》、《记承天寺夜游》等；诗歌如《和子由澠池怀旧》、《游金山寺》、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、《八月十五日看湖》、《题西林壁》、《新城道中》、《荔枝叹》、《闻捷》、《洗儿》、《惠崇春江晚景》等；词作如《江城子·老夫聊发少年狂》、《江城子·十年生死两茫茫》、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、《浣溪沙·山下兰芽短浸溪》、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、《念奴娇·大江东去》、《蝶恋花·花褪残红青杏小》、《卜算子·缺月挂疏桐》、《水龙吟·似花还似非花》等，上述作品都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，历来为人们所喜爱、传诵。千载之下，展卷吟哦，他那豪放的文风，宏阔的意境，清新流畅的格调，挥洒自如的才情，独具魅力的艺术个性，仍不能不令人为之叹服。

苏轼一生著述宏富，主要有《东坡集》四十卷，《后集》二十卷，《续集》十二卷，《奏议集》十五卷，《外制集》三卷，《内制集》十卷，《应诏集》十卷，《易传》九卷，《书传》十三卷，《论语说》五卷（已佚），《广成子解》一卷，《东坡志林》五卷，《仇池笔记》二卷。

·
目
录
·

苏轼传	/ 9
少年不凡	/ 10
出蜀入京	/ 12
汴京风云	/ 17
宦游江湖	/ 20
乌台诗案	/ 30
被贬黄州	/ 35
蒙召重用	/ 39
四任知州	/ 42
远放天涯	/ 46
辉煌的文学成就	/ 51
 苏轼作品选	 / 65
诗	/ 66
赋	/ 106
叙	/ 115
记	/ 124

传 / 155

论 / 167

志林 / 222

·
苏轼传
·

· 少年 不凡 ·

苏轼这个名字,在我国可以说是妇孺皆知。他不仅是一个大文学家,而且还是大书法家、画家。有关他的轶事流传甚多。

苏轼,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,四川眉山县人。他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,照公历推算,是1037年1月8日。

他出身于一个富有文学气氛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。父亲苏洵,字明允,因屡试落第,愤而烧毁自己的文章,再度悉心攻读,终于成为著名的古文家。哥哥景先,早卒。弟弟苏辙,字子由,是苏轼一生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同道,两人感情十分深厚。由于父子三人的文学成就,并称“三苏”,又分别称为“老苏”、“大苏”、“小苏”。苏洵曾自称“布衣”,“堕在草野泥涂之中”,苏轼也说“生于草茅尘土之中”,苏辙在《上枢密韩太尉书》中说他“居家所与游者,不过其邻里乡堂之人,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”,都反映出一个并非富有的中小地主之家的境况。

苏轼八岁时入乡校读书。老师是天庆观道士张易简,他在近百个学生中独独赏识苏轼。苏轼对这位教了他三年的启蒙老师,直至晚年谪居海南岛时还梦见他。十岁时,改由母亲程氏讲授。十二岁时,苏洵从外地求宦游学返家,苏轼和九岁的苏辙便由父亲教授。一次,苏洵命他俩作《夏侯太

初论》。夏侯玄(字太初)是三国时魏国的重臣。当时司马师继其父司马懿之后专权篡政,任大将军。夏侯玄参与了推翻司马师的密谋,事泄被捕。他临斩时,颜色不变,举动自若。据说他平日即处事镇静,一次“倚柱作书,时大雨,霹雳破所倚柱,衣服焦然,神色无变,书亦如故”(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)。苏轼借以评论说“人能碎千金之璧,不能无失声于破釜;能搏猛虎,不能无变色于蜂虿”,极力形容人们在有思想准备和无思想准备时表现的不同,推崇夏侯玄临危不惧的精神。这两句话,初次显露出苏轼随机生发、翻空出奇的雄辩才情,受到苏洵的称赞。苏轼成年后还把它用在他的《黠鼠赋》和《颜乐亭诗序》中。

幼年的苏轼不仅受到深厚的祖国传统文化的熏陶,而且也接受正统的儒家经世济时的政治理想的教育。他八岁开蒙的那年,即庆历三年(1043年),宋仁宗正锐意改革弊政,撤换吕夷简、夏竦等保守派大臣,起用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等革新派人物,政局有所刷新。国子监直讲(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的官员)石介写《庆历圣德诗》加以颂扬。这首诗传到了四川,苏轼诵习之余,对韩、范、富、欧阳四位“人杰”十分仰慕。他的母亲程氏是一位有政治见解的妇女,有次她给苏轼讲《后汉书·范滂传》。东汉“名士”范滂反对宦官专权误国,汉灵帝建宁三年(169年)大逮党人,他镇静自若地前去投案,其母和他诀别说:“汝今得与李、杜齐名,死亦何恨!既有令名,复求寿考,可兼得乎?”程氏讲到这里,激动不已。苏轼问:“轼若为滂,夫人亦许之否乎?”程氏坚定地答道:“汝能为滂,吾顾不能为滂母邪!”苏轼十分感动,“奋厉有当世志”(《东坡先生墓志铭》)。

苏轼正是怀着这样的政治抱负离蜀赴京,找寻出路的。

· 出 蜀 入 京 ·

嘉祐元年(1056年)三月,苏轼兄弟随父离家,从陆路自阆中(今四川阆中),度秦岭,经关中,最后于五月到达汴京。

八月,苏轼与苏辙在开封府考进士,同时获选。按照宋朝的规定,府试以后还要经过中央礼部(负责礼仪、祭享、贡举等事)的考试和皇帝亲自主持的“殿试”。兄弟俩住在兴国寺准备应考,苏洵则投书欧阳修、富弼、韩琦等人,受到他们的重视。第二年正月,欧阳修以礼部侍郎(礼部的最高长官)、翰林侍读学士(给皇帝讲书的侍从官)知贡举。他对当时流行的奇诡艰涩的文风深为不满,把平易流畅的文风作为取士的标准。苏轼的考卷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得到他的特别赞赏。据说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后说:“不觉汗出。快哉!快哉!老夫当避路,放他出一头地也。”经过仁宗的“御嗽”,苏轼赐进士及第,苏辙赐同进士及第。宋仁宗高兴地对他的皇后说:“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。”

不料程氏在家病逝,苏洵父子只好回蜀奔丧。在封建时代,父母或祖父母死去,子孙辈必须谢绝人事应酬,如果是做官的人,还需解除职务,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,叫做守制或丁忧。苏轼便丁忧家居。

嘉祐四年(1059年)十月,父子三人再度赴京。这次是走水路。他们经

现在四川境内的嘉州(治所在今乐山)、泸州(治所在今泸州)、渝州(治所在今重庆)、涪州(治所在今涪陵)、忠州(治所在今忠县)、夔州(治所在今奉节),出三峡,到了江陵(今湖北江陵),已是岁末。一路上,碧波滔滔的长江,秀丽多姿的巫山,忠州的屈原塔,夔州的八阵图,其他如神女庙、昭君村、黄牛庙、虾蟆碚等山川文物、名胜古迹,处处震荡着他们的襟怀,激发起他们的才思,他们写下了不少作品。江陵以后的路程,将改由陆路北上的。为了纪念这次舟行,他们就把三人途中所作诗文一百首,编为《南行集》。其中有苏轼诗四十首,这是现存苏诗中的最早一批作品,可以看作他诗歌创作的起点。这些作品初步显示了苏轼的政治抱负和诗歌才能。

嘉祐五年(1060年)二月,苏轼到达汴京。礼部授予他以河南府福昌县(今河南宜阳县西)主簿的官职,办理文书等事务。但他并没有去赴任,而是与苏辙一起准备“制科”的考试。原来唐宋时除了“进士”、“明经”一类“常举”以外,还有一种皇帝特别下诏举行的考试,叫做“制科”。嘉祐六年(1061年)八月,苏轼以“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”考入第三等(为“上考”),这是极大的荣誉。从宋初以来,被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他两人。考试毕,他被授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(治所在今陕西凤翔)签判的官职。苏辙考入第四等,被任为商州(治所在今陕西商县)推官(州的属官,掌管审案);但因苏洵奉命在京修礼书,他奏请留京侍奉父亲。他送哥哥赴任,到郑州分手。

兄弟俩第一次离别,情绪不免感伤。唐代韦应物在《示全真元常》一诗中有“宁知风雪夜,复此对床眠”的名句,意思说,今夜雨雪对床畅谈,极惬人意,以后哪一天复能如此?苏轼回忆往昔兄弟俩同读此诗,感触很深,曾约定日后一起退隐,纵情山水。想到这里,觉得高官厚禄并不值得追逐。

· 中国十大文豪 ·
苏轼

但是,北宋初年积贫积弱的社会局势唤起他平素怀抱的济世之志,逼着他睁开眼睛正视现实。宋朝是比以往几个统一王朝更注重中央集权的朝代,它把军权、政权、财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中,这是宋代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。当时官僚机构庞大臃肿,腐败无能;在财权集中方面,规定地方财赋绝大多数上交中央,又刺激了上层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,挥霍享乐,到宋仁宗时,国库空虚,“惟存空簿”。这使固有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,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。开国不过三十多年,宋太宗时就爆发了王小波、李顺的农民起义,人数达数十万,就是突出的例证。宋朝缺乏抵御外来侵扰的能力,一直处在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之中,每年向辽、夏输纳大量“岁币”(银、绢),给财政造成沉重负担。

正是在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,有些改革家就出来主张“变法”,要求革除弊政,缓和危机,形成了变法运动。

庆历三年(1043年),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(副宰相),富弼、韩琦为枢密副使(全国军事机关的副长官),要他们提出改革方案。范仲淹就提出“明黜陟”、“厚农桑”、“修武备”等“十事”。宋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,并颁行全国,号为“庆历新政”。但事隔不久,就因保守派的反对而失败,范、富罢职,韩琦被迫出赴外任。

“庆历新政”的失败更促使社会矛盾的急剧发展。封建士大夫中仍然酝酿着新的改革浪潮,一些局部性质的改革活动也在渐次展开。这是王安石变法前的酝酿期。苏轼这时的基本政治倾向是要求变法。他写了不少政论文,从要求革新的政治理想出发,继承汉代贾谊、唐代陆贽的政论精神,结合历史经验教训,分析当前形势,研究治国之策。代表作就是考“制科”时所写的《进策》(包括总论性质的《策略》五篇、讲具体改革措施的《策

别》十七篇、讲辽和西夏问题的《策断》三篇)和嘉祐八年(1063年)在凤翔任上所作的《思治论》。

这些政论文在文风上深受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影响。它的特色是汪洋恣肆,辩才无碍。宋人李涂《文章精义》指出,苏轼上述《策略》等“论利害”的政论,学之于《战国策》;并说,“苏门文字,到底脱不得纵横气习”,是正确的。它常被旧时代的举子们奉为楷式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卷八曾记当时俗语说:“苏文熟,吃羊肉;苏文生,吃菜羹。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苏轼这类文章的影响。

这一时期是苏轼诗歌创作的初步活跃时期。和政治上主张改革相一致,他的作品中也以关心国事、反映民生疾苦为重要主题。他经常作贫富悬殊的对比:“蜀人衣食常苦艰,蜀人游乐不知还。千人耕种万人食,一年辛苦一春闲。闲时尚以蚕为市,恐忘辛苦逐欣欢。”(《和子由蚕市》)同是“蜀人”,苦乐如此不均。这个对比正说明作者对封建社会中贫富对立的现象有着较深的感受。

天寒降雪,他叹道:“有客独苦吟,清夜默自课。诗人例穷蹇,秀句出寒饿。何当暴雪霜,庶以蹶郊贺!”

他还写了一些指斥时弊的诗。如咏史诗《郿坞》,借古喻今,语多讽刺:

衣中甲厚行何惧,坞里金多退足凭。毕竟“英雄”谁得似?脐脂自照不须灯。

这首诗是嘲骂汉末董卓的。董卓是个奸相,怕人行刺,在衣内加了厚甲,自以为可以确保生命安全;他把民脂民膏搜聚在他所盘踞的郿坞,扬言“事成雄据天下,不成守此足以毕老”。然而,他后来失败了,被暴尸长安,

时遇酷暑,肥胖的躯体流脂满地,人们对他恨之入骨,就在他的肚脐眼装上灯蕊,像点灯似的烧了几天。诗的后两句说:照明不须灯,真算个“英雄”!嬉笑怒骂,鞭挞有力。这对当时疯狂地聚敛民财的官僚贵族,无疑是个严重的警告。陈师道曾说:“苏诗始学刘禹锡,故多怨刺”(《后山诗话》),是不错的。

苏轼这时期的诗在艺术上也趋于成熟。组诗《凤翔八观》八首就代表他当时五七言古诗的成就。凤翔是有名的古都,文物很多,秦刻的“石鼓”,秦碑“诅楚文”,王维、吴道子画的竹和佛像,唐代著名雕刻家杨惠之所塑的维摩像,东湖,真兴寺阁,李氏园,秦穆公墓,被称为“凤翔八观”,苏轼都一一加以吟诵。尤如《石鼓歌》,从“冬十二月岁辛丑,我初从政见鲁叟”开始,写他嘉祐六年(1061年)冬,初到凤翔任,即去孔庙谒圣,见到石鼓;然后详细描写石鼓的文字和经历,最后以“兴亡百变物自闲,富贵一朝名不朽。细思物理坐叹息:人生安得如汝寿”作结,感叹历史兴趣,富贵殆尽,只有这岿然石鼓却是永恒的存在,成为我国传世的宝物(今存北京)。全诗六十句,用词典雅而摹写入微,结构严谨而时起波澜,刻意锻炼,惨淡经营。这之前韩愈也写过《石鼓歌》,苏轼此诗有意和他争胜,终于成为吟诵石鼓的两篇名作。

苏轼在凤翔任职三年多,于宋英宗赵曙治平二年(1065年)正月还朝,以殿中丞(管理宫廷事务的殿中省的官员)差判登闻院(受理官民建议或申诉的机构),又经过学士院的考试,授官直史馆(编修国史机关的官员)。这时,他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:妻子王弗卒于京师;接着父亲苏洵又病故,他就和苏辙一起扶柩从水路回蜀,并为父亲守丧家居。